

党史上的工作纪律建设

□ 郑东升

工作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党的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100多年来，我们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健全和完善党的工作纪律，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党的工作纪律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做法。

强化遵守工作纪律的基本要求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建党伊始，生存和发展是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保密纪律作为基本工作纪律提了出来。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中，即将保密纪律作为必须遵守的基本工作纪律作了明确要求，其中第六条强调“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1927年12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人住处和秘密机关的地址地点。白色恐怖下，一切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不能出半点差错，对工作纪律的要求极为严格，“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当时文件要用药水密写，传送要通过秘密交通躲过敌人搜查。这一时期，尤其强调“秘密工作之执行应该成为党的纪律之主要部分”。一切“不负责的传说党内的秘密”“不遵守开会时间”等都是党所不容许的，“凡是一切违反秘密工作的行动，毫不迟疑的应该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长征期间，一个12人的运输班严格遵守党组织的工作安排，历尽千辛万苦，用担子把建党初期许多重要原始档案和文件挑到陕北，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体现了我们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和对纪律的严格遵守。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制定得比较成熟、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纪律就达20余项。1947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时强调：“以后凡中央密电所发出之任何文件，凡未得中央许可者禁止印发。”“私人不得记录党政军机密事

件及不得携带此种笔记本。”这一时期，为了克服党内和军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党还建立健全了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了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持续加强党的工作纪律建设，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注重发挥制度的作用，切实提高党员的纪律意识与纪律观念，使工作纪律建设形成更为稳固的刚性约束。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更加注重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相结合，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推动党的工作纪律落到实处。

注重规范党员干部履职用权

严明的工作纪律，是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积极担当作为的重要保障。党的一大决议中规定：“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这既是政治纪律，也是基本的工作要求。二大党章强调，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1930年4月，为应对形势需要，海丰县苏维埃政府颁布工作条令，制定了统一的经济工作纪律，比如，规定各县区苏维埃、革委干涉支配财政者，由四县革委惩戒该苏维埃、革委负责人；各级财委不努力执行自己任务者，亦应受惩戒；等等。通过规范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增加了财政收入，极大地缓解了经济压力，为革命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西柏坡时期，对于收复城市、管理城市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党中央及时制定相关工作纪律予以纠正。1948年6月4日，《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专门规定了入城纪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施、名胜古迹和建筑物；实行缴获归公，提出“四个不”，即不争夺、不破坏、

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上海解放后，陈毅细数干部违反纪律的表现后指出，我们进入上海必须讲纪律，必须反对无纪律的状态，“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他的看法报中央军委后，很快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批示，只有8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制定出台多项党内法规，细化了违反党的工作纪律的各种情形，明确了相应的党纪处分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工作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强调党内法规制度对党的工作纪律建设的重要作用，规范权力的使用和运行，并且进一步将履职不力、不作为纳入问责情形，以明确的纪律规范树立正确导向，不断推动和规范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重视保持优良工作作风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优良工作作风是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大革命初期，随着党员队伍日益壮大，党内出现了理想信念不坚定、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针对这些情况，1926年8月，《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要求“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是为至要”，表明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重视和加强工作作风建设的坚强决心。随着各项规章制度相继出台、对一批违纪党员干部的严肃处理，极大地净化了政治生态，保证了干部队伍纯洁性和先进性。1933年12月2日，《红色中华》报专门撰文，列举了当时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包括：无工作计划、不参加会议、参会不发言、不开展组织工作、不搞调查研究、不汇报工作，连起码的文件都不处理，甚至对联系的工作对象的名字都不记得，等等。针对这些工作作风问题，中央苏区时期

出台的文件明确指出：“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干部的工作及其成效如何，评判权交给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居安思危，高度重视党的工作纪律建设。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随即，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不久，按照规定成为各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这为监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纠正党内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提供了重要抓手。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取得了作风建设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开创了从严管党治党的新局面。

党的工作纪律建设100多年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要始终强化工作纪律意识，树牢底线思维，自觉绷紧工作纪律这根弦。要始终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完善相关党内法规制度，发挥党内法规制度的监督保障作用。党的工作纪律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纪律等紧密相连，要坚持工作纪律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一起抓，注重系统联动，协同推进包括工作纪律在内的党的纪律建设。要保持对违纪人员的惩处力度，既突出党的工作纪律的规范引导、控制约束作用，也发挥纪律刚性的警戒告诫、惩罚威慑作用。党纪教育是加强党的工作纪律建设的基本手段。习近平总书指出，“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回顾党的历史，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每当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我们党都通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切实提高了党员的纪律性，为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六十五军烈士纪念碑建于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华林山烈士陵园。纪念碑主体高11.6米，始建于2010年8月，建成于2011年5月，整体造型为拱门形，外观以浅色为主，庄严肃穆。塔门高6.5米，至上檐8.26米，寓意六十五军参加兰州战役，并于8月26日解放兰州。四门开阔通达，以示人民军队能征善战、所向披靡；外部石材大部选用花岗岩，表达我军将士英勇不屈、凛然正气；雕塑所用汉白玉材料来自千里之外的原六十五集团军驻地——河北，以寄托对英烈忠骨长眠他乡的无限哀思。纪念碑底座刻有写于1949年9月的《解放兰州马家山战斗烈士碑志》，全文如下：

此次解放兰州之战，本军奉命攻击古城岭马家山匪阵地。赖当地人民热烈支援，及全体指战员拼死与马匪顽强战斗，将马匪步芳主力部队一百师击溃。在友军有力配合下，卒将匪部十二军歼灭于黄河南岸，马家山古城岭阵地解放。并造成了继续进军肃清西北残匪的有利形势，大大的缩短了西北全境解放的时间，马匪全部被歼灭的目的实现。

古城岭马家山战斗者（中），马匪凭借险地盲目顽抗，乃是表现了马匪步芳的绝命挣扎。这种顽抗完全是徒劳无意义的，并且马匪士兵的伤亡也是完全没有代价的。在此次战斗中充分地又一次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是技长敌军一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如此顽强，而出乎马匪步芳意料之外，使马匪阵地迅速崩溃瓦解。这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每一个同志都了解是为了人民而战，深切了解人民的疾苦，救兰州人民于水深火热之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因此任何反动武装均不能抵抗解放军的进军。

在此次战斗中，五百三十名同志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兰州人民的自由幸福，为了西北二千万人民的自由幸福，毫无保留的贡献自己的一切于解放事业，直到贡献自己的生命。他们用血换来了兰州解放，并大大的加速了西北全境解放进程。他们的死是有伟大意义的，他们可当之无愧，而且永远是人民功臣。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光荣烈士！他们是兰州解放之役的重要力量。特立此碑于兰州市永兹纪念。烈士们的遗志是解放全西北，建设全西北，解放全中国，建设全中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他们的遗志也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也就是本军进军的目的。全体作战人员必须继续努力，为实现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及建设新中国而加緊努力奋斗！并望西北各界人民、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在革命先烈开辟的道路上为自己、为人民、为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到底！

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敬立

碑文简要概述了马家山战斗的历史背景、重大战果、战略意义，缅怀了战斗中牺牲的英烈，号召全体作战人员为实现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及建设新中国而加緊奋斗。敬读碑文，思绪万千，深觉我辈定要继承先烈遗志，一往无前。

敌筑坚固工事顽抗，我军将士出师不利

1949年8月21日，彭德怀率部挥师兰州。马家山扼兰州东南要冲。经过多年经营，筑有永久性防御体系。阵地铁丝网密如蛛网，地雷区似马蜂窝，钢筋水泥碉堡星罗棋布，野战工事隐蔽地下、相互交叉，火力严

他们用血换来了兰州解放

——六十五军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郝然

密配备、互相支援。各支撑点之间，埋设鹿砦、铁丝网和地雷。从前沿至纵深挖有深宽各约6米的外壕3道。守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利用宗教迷信和民族成见进行欺骗宣传，顽固不化。

8月21日至22日，时任一野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将这块难啃的硬骨头交给了六十五军。担任主攻任务的五七九团，在山南下家路口一线展开。由于部队长途奔袭而来，对驻守在这个阵地上的敌军特点、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置等情况，来不及作周密的侦察就仓促进攻，尽管指战员奋勇杀敌，一度取得突破，但伤亡严重。双方经过多次拉锯战，终因敌人居高临下、工事隐蔽，我军未能突破敌人防线，无奈引兵暂退。

加大兵力，发动总攻

攻城部队枕戈待旦，组织小分队夜间侦察敌情，及时总结战斗经验，制定作战方案，充分做好总攻的准备。

8月25日拂晓，随着军长邱蔚、政委王道邦一声号令，我军炮火向敌方阵地倾泻，马家山瞬间陷入火海。随着炮火声戛然而止，总攻冲锋号响彻山谷，战士们迅猛发起冲锋。担任此次总攻尖刀的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五七九团二营四连二班在第二道外壕前正面迎敌时，突遭敌交叉火力的封锁和压制。班长杨顺文右臂负伤仍冲锋在前，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带领战士连续攻克5个碉堡，夺取了山头，占领了阵地。为了减少后续部队伤亡，战士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一次次抵挡住了敌人凶残的反攻。当主力部队上来后，“孤胆英雄”杨顺文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为了加速战斗进程，兄弟部队加入战斗，以杨顺文坚守的阵地为立足点，发起了强大攻势，我军迅速越过第二道外壕。指战员昼夜奋战，攻占全部3道外壕，并迅速向纵深发展。敌人在兰州外围的最后一个阵地失守，守军残敌向兰州市区溃逃。马家山战斗胜利结束，歼敌2600余人，我军530名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战斗期间，皋榆工委发动榆中全县共为解放军筹粮约2250万公斤，动员支前民工3.5万多人，支前牲畜1.7万余头，支前大车1500多辆（次），将粮草、马料送往解放军驻地。马家山战斗成功撕开了“攻不破的兰州”的铜墙铁壁，为兰州的解放打下坚实基础，而人民的力量是这场战斗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陕甘宁边区如何组织动员妇女参加劳动

□ 韩惜园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受战争影响，边区青壮年男子劳动力不足，又增加了破局的难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从发展经济和解放妇女的双重目的出发，积极组织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使广大妇女以饱满的热情挑起边区经济建设的大梁。

宣传妇女劳动光荣。边区政府自1939年起先后发布婚姻条例、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和规定，推动婚姻自由、夫妻平等以及妇女放足。这为解放妇女身心、寻求劳动自立奠定了基础。为了宣传妇女劳动光荣理念，妇女干部们在集会、庙会等场景张贴标语、传唱民谣。她们还深入到各家各户，一边帮妇女做家务，一边用浅显直白的语言给妇女讲解参加生产的好处和妇女解放的道理。边区举办的“妇女生产展览会”更是让妇女们对自身的生产才干感到骄傲。通过全面的宣传动员，妇女们意识到“还是劳动好，又落名声又过好日子”，还有人编了顺口溜：“从来男人养活女人，现在女人也养活男人”。

表彰妇女劳动英雄。边区以树立榜样方式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300多名妇女劳动英雄被分批评选出来，其中马杏儿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马杏儿本是与父母一起逃荒来到延安南三十里铺。父亲马丕恩与当地农民签约租下土地并借来耕牛和工具，15岁的马杏儿不顾母亲反对决定随父亲一起下地劳动。农场职工开展开荒竞赛时，马杏儿每天能开1.8亩地，最快时达到2.5亩，不亚于身强体壮的男青

年。通过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马家的收成明显超过其他农户，第二年就实现了“耕一余二”（一年劳动两年余粮），成为周围村镇勤劳致富的榜样。1943年边区嘉奖马氏父女为劳动英雄，特别表彰马杏儿不仅为家庭作出贡献而且通过劳动“从经济上造成独立的人格”。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笔题词“妇女光荣”赠予马杏儿。此后，边区迅速掀起了学习马杏儿的热潮。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以马杏儿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该剧以“生产不分男女”为主题，引领了边区的时代风气。

被评为劳动英雄是一种荣誉，相反，被评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则很不光彩。在边区发起的“二流子”改造运动中，各地根据她们特点制定了改造策略。比如定边把无小孩的落后女子组成小组在塞北工厂里纺织羊毛，并发给她们工资，有小孩的则在家纺织，由专人督促；绥德让落后女子出席奖励劳动英雄的大会，她们在会场羞愧地低着头，决心向劳动英雄学习。延安县蟠龙区尽可能利用其娘家、丈夫等关系去说服教育。经过改造，大部分落后女子转变成劳动能手。

推动妇女纺织运动。纺织业是边区妇女劳动生产成绩最突出的方面。延安南区柳林二乡的妇纺运动首先成为各地学习的典范。柳林二乡的妇女历来没有纺织习惯，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办法把妇女广泛动员起来。他挨户了解访问，发现李国泰的妻子会纺纱，便将棉花和纺车送到李家，讲明纺一斤纱挣一斤棉花，交好纱还有奖金，买布还能优惠。这样，李家母女纺了一年



《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3月9日报道马杏儿等七名妇女劳动英雄受奖

纱，挣钱买了农具、布匹，还给李国泰缝了一身新衣裳。过去的“穷光蛋老李”如今衣着光鲜到处走动，逢人便夸婆姨纺纱好。这样一宣传，乡亲们“眼红”了，纷纷让媳妇跑到李家学纺纱。接下来，南区合作社又推出更多优惠条件。很快，柳林二乡220户妇女都掌握了纺织技术。到1942年底，南区妇纺发展到800人，柳林二乡布匹基本实现自给，妇女们也因增加了家庭收入而提高了家庭地位。赵烽等妇联干部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蹲点调查，写成调查报告。中央妇委书记蔡畅进一步总结其经验，并号召广大妇女干部向刘建章学习。

1943年三八节之后，依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进一步推动妇女纺织运动。政府采购新式手工纺织机发给各纺织家庭，银行发放专门的纺织贷款以支持民间纺织作坊。妇女工作者们背着纺车和棉花深入农村、山区开办纺织训练班。